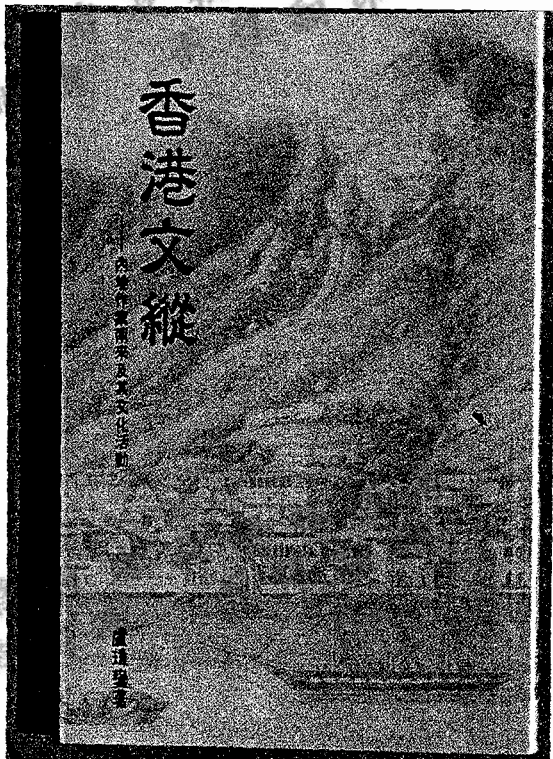


盧瑋鑾 · 真正而誠實的

香港文學史研究家

古遠清



(一)

小思的散文，在香港作家中風神挺拔，別具一格。她用「盧瑋鑾」本名發表的一系列香港文學史研究論著，慎重與謹嚴的文風，同樣給廣大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盧瑋鑾有關香港文學史論著和資料性著作，共有五種。此外，還有不少散見於《香港文學》、《抖擻》、《八方》、《聯合文學》等報刊上來不及結集的文章。

在她的論著中，最重要的是《香港

文縱》。①此書共十篇文章，提供了三十年代香港文學界的組織活動、文藝論爭及創作的概況。具體說來，涉及香港早期文學的發展，一九三六—一九四一年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進會組織及活動、抗戰初期香港文藝界的分歧。還有陶行知、茅盾、蕭紅、豐子愷、戴望舒等名作家在香港的文學活動情況。這對弄清香港到底有無文學，如有應從何時開始，以及南來作家對香港文學發展到底起到什麼作用、左右派的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到香港文藝

界、關於反對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背景與經過……均十分有幫助。該書內容雖不夠系統，且史多於論，有的甚至全是史料而無論，但畢竟是自有香港文學以來第一次較具規模的史的研究。作者謙稱這不是「史」的著作，但她所作的史料的整理與歸納，掃清了各種前進的障礙，為後人寫史提供了極好的參照系，以至著者被學術界譽為「香港新文學史的拓荒人。」②這從大陸學者後來出版的香港文學斷代史或「概況」一類的書籍，從盧著中吸收了大量的材料，便可見一斑。著名香港文學評論家黃繼持在

該書的序中曾說：盧瑋鑾女士「對史料的尋索，廣博精微，結合中國的史學傳統與日本的資料學方法，不徒駕舊編出，兼且金針示人。就在這個可覆核可檢證的研究成果上，其有論斷，每能祛疑去障以學術的『客觀性』超越政治因素或意識形態的偏倚。」這個評價十分中肯。

盧瑋鑾另一本研究香港文學的開風之作是《香港文學散步》^③。此書為編著，分上下兩篇。上篇為憶故人：蔡元培、魯迅、戴望舒、許地山、蕭紅。下篇為臨舊地，包括孔聖堂、學士台、六國飯店、何福堂中學。書中記載的戴望舒等人的故事，雖不驚心動魄，却處處與香港歷史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可惜這段歷史不是被人遺忘，就是被有些史學家以意識形態的偏見扭曲。「尚幸有心人如小思者，曾為扶發申張，於是我們經過薄扶林道、奧卑利街、利源東街時，分外感到文人的溫謫與淒酸。蕭紅和戴望舒都未盡其才。來過香港的文人才未盡、志未酬者，又豈止蕭戴二位！才未盡，志未酬；匡時救國，書生素志，襟抱可敬而遭際可傷。」^④盧瑋鑾在回憶故人、憑吊舊地時用散文形式所寫下的一篇篇充滿感情色彩的文字，讀後不僅使黃繼持感慨萬千，也引起廣大讀者無窮聯想。她收集的這麼多文學史料，或者說她繪寫的這些香港文學的行

腳圖，足以喚起廣大讀者尤其是歷史感淡泊的青年，前來尋根認往。

《香港的憂鬱》^⑤不是編著而係文章編選，其書名取自樓適夷的一篇文章。該書所展示的是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一年的「文人筆下的香港」。編者收集了從聞一多到徐遲有關香港的詩文，其中許多文章連作者本人都忘却了。是盧瑋鑾從塵封發黃的故紙堆裏發掘出來，重新展示在廣大讀者面前。

錢鍾書曾給專門在舊報刊中找作家佚文佚事的人稱為「發掘文墓者和揭開文墓者」。盧瑋鑾十分贊同這種稱呼，她曾在「一篇夫子自道的文章《掘文墓者言》中稱自己為「掘文墓的人」。《綠綠堂集外遺文》^⑥和與人合編的《茅盾香港文輯》^⑦，便是她把別人逛商店、看電視的時間用來「掘文墓」所得出來的成果。「掘文墓」對有些去逝的作家來說，不存在什麼問題，對某些健在的作家，却有可能引起不快。因這些佚文有的是作家本人故意遺忘的——或悔其少作，或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而不願公諸於世。盧瑋鑾作為一名文學史工作者，自然顧不了這麼多。只要是客觀存在，她都尊重歷史事實，還其本來面目，決不為賢者諱。

盧瑋鑾的香港文學史研究，始於一九七七年。那時，她利用課餘時間從事一九二五至一九五〇年間文藝資料收集工作。一九八一年，她寫了《中國作家

在香港的文藝活動》的論文，以此取得了香港大學的碩士學位。自此以後，她右手執教鞭，左手寫散文，還有可疑的第三隻手從事文學研究，尤其是在史料鉤沉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二)

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身世十分矇矓的城市。對香港歷史，歷來研究者不多；至於香港新文學史，從來都視為缺門。也許有人認為，香港是個殖民地，人們缺乏歸屬感。這話自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怪香港人。忙碌的生活，使他們沒有餘暇關注以往的事情。不向後看向努力朝前看（或曰朝錢看），緊緊追隨世界發展大潮，這是香港的生活節奏。盧瑋鑾不去跟隨這股向前（錢）看的潮流而老向後看，成天和塵封已久的書刊打交道，默默做着枯燥無味又毫無經濟效益的史料整理工作，不能不使人佩服她的細心與恆心，以及為文學研究事業獻身的精神。不少人均認為，盧瑋鑾是香港學者中最有資格撰史的人。可她對寫史總抱着一種慎重的態度，認為目前不具備寫史的條件，因為香港文學研究這門新科學還處於開創階段，「既無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記都還沒有，就急於編寫《香港文學史》，是十分危險的事情。」^⑧為了改變這一局面，她決心從我做起，先後編寫了《香港文學活動記事》（一九三七—一九四一）^⑨、《二十年



香港文藝活動表》⑩。前者屬現代部分，後者屬當代（一九七二—一九九一）部分。另有微觀方面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活動紀事》⑪、《許地山在香港的活動紀程》⑫、《中國文化協進會（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活動志》⑬、《茅盾在香港報刊（一九三八—一九四一）上發表的著作》⑭、《蕭紅在香港發表的文章——蕭紅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補遺》⑮等等。此外，她還花了十年時間，整理出一九三九至一九五〇年間，約三百位中國文化人的資料，另有香港早期報紙副刊如《立報·言林》、《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的目錄索引。這些原始資料的整理，為香港文學史的編纂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遺憾

的是這些索引由於發表園地原因未能一一公諸於世。作為一個當代香港文學的關注者，我極希望她能再編寫《香港當代文學大事記》、《香港當代文學論爭紀要》、《香港當代文學書目》。也許她已經做了或正在做，也許她根本沒有這麼多的精力去繪製這些香港文學行腳圖。作為一個業餘文學研究者，無論時間、精力、財力均十分有限，她對許多作家要她義務提供資料已無法招架，再希望她從事別的新項目研究無異是一種苛求。筆者也不希望她將這些「年表」或「大事記」無止境地製作下去。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該動手寫史。現在，學術界急切盼望一部完整可靠的香港文學史。是到了撰寫香港文學史的時候了！對這種香港文學史，我們不能要求一下就完美無缺，可先以「初稿」一類的形式問世。做，總比不做好；有，總比沒有好。當然，這裏講的「有」，絕不是東拼西湊、謬誤百出的「有」。基本滿意即可，但絕不能出現「司馬長風是武俠小說家」⑯一類不可饒恕的常識性錯誤。

也許有人會認為，史料工作是「低級階段」的工作，只要不怕鼻子過敏——塵封的報刊弄得你不斷打噴嚏，再加上持之以恆，可以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做。這是一種偏見。搞文學史料研究，必須有文學理論、文學史以及目錄學、考據學等多方面的常識。不要說初中文化程度就是大專畢業生，都不見得人人能完全勝任這種工作。而盧璋鑾做史料工作，事前作過充分的理論準備。尤其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香港地區文學狀況作過深入的鑽研，她才能在訂正與鉤沉中，發現衆多沒沒無聞的作品，如茅盾在港期間用別的筆名發表的雜文及補白文字，⑰蕭紅在港最後一年寫成的短篇及散文，以及為健在林煥平提供他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年表，等等。此外，《茅盾在香港的活動（一九三八—一九四二）》、《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⑱等文亦填補了茅盾、戴望舒研究中的空白。

（三）

「中國文學史料學」是一門學科。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香港的高等學校，都很少有人開這門課，更不用說北京師範大學單獨開出的「新文學資料引論」。盧璋鑾本人也沒開過這門課，但她在實踐中所做的正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工作。

文學史料學講究史料不同層位的區分及其價值的評判，講究史料的不同搜集方法。以後者而論，盧璋鑾善於將函簡求述與採訪面詢結合起來。如爲了弄清茅盾抗戰期間主編的綜合性的文藝刊物《筆談》上所使用的各種筆名，她曾寫信向孔海珠女士請教。她選擇的信函採訪對象，均爲知情者，要求他們回答的問題具體單一，與切磋學術問題的信訪不同。當遇到範圍較廣的資料搜集或了

解的問題比較複雜時，盧瑋鑾便改用直接採訪方式，讓自己與研究對象在思想和藝術上展開雙向交流活動。在直接見面前，她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首先是充分熟悉研究對象的生平經歷、主要著作內容，有關他的回憶文字和別人對他的評價等等。然後在設計提問上下功夫，通過聊天的方式成功地喚醒沉澱在研究對象腦海中儲存多年的史料。如她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採訪徐遲、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採訪高貞白有關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會的成立情況，就是這樣做的。

無論是函簡求述還是直接採訪來的史料，都有一個鑑別問題。當事人的回憶，由於年代久遠，難免有誤記之處。如豐子愷一九四九年抵香港時間，知情者李君毅口述資料說是三月下旬，盧瑋鑾信以為真，在《豐子愷二三事》文章中誤用了這條資料，而豐一吟、潘文彥等合著的《豐子愷傳》^①，也轉引了，造成以訛傳訛。後來盧瑋鑾查閱了《星島日報》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第六版所報道的《當代名書畫家豐子愷氏抵港》的消息後，才糾正了這一謬誤。

把收集得來的資料加以核實鑑定，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有時爲了考證一個日期、一條街名或組織名稱前後的變化，查閱衆多史料或採訪多人，往往得不到準確的答案，甚至越弄越胡塗。如戰前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

港分會」，出現了「同會異名」的情況，前後用過的名稱達六個之多。盧瑋鑾爲此曾訪問過當事人馮亦代、郁風、施藝存，他們不是忘記了，就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又如據施藝存來函和吳曉鈴提供的資料，戴望舒曾用「施藝存」之名發表過文章，又與戴杜衡共用過「江思」的筆名，這無疑給研究工作帶來極大的麻煩。對這種複雜的情況，盧瑋鑾均採取慎重的態度，一律作待考處理。

曾有人認爲中國古典文學才有考證問題，現代文學所經歷的時間不長，用不着考證。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拿文章署名來說，現代文學比古代文學更複雜，有用作者本名的，有爲了逃避文網使用化名、假名的，還有出於沽名釣譽的卑鄙目的冒名人之名的，也有如上所說的借用關係比較親密的人之發表文章的，還有兩人共用一個筆名的，這都要辨析、考證。盧瑋鑾的辨析、考證，自然不限於署名問題。下列幾個方面，也是她辨析、考證的範圍：

一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或某種歷史的誤會，將進步作家打成「落水文人」。如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在《三閑集·文壇的掌故》的注文中，有這樣的字句：葉靈鳳在「抗日時期成爲漢奸文人」。可據盧瑋鑾查閱胡漢輝在《四十年後話中新》^②一文，葉靈鳳曾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同（原文誤作「大同」）公司工作之便，

「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胡漢輝做敵後工作。「由此可知他們爲了生活，在此局工作，但並不是真心敵。」^③葉靈鳳的「漢奸」帽子早在一九八一年北京新版的《魯迅全集》中摘去，但盧瑋鑾畢竟又再次爲人們提供證據，並談了她自己對葉靈鳳在敵僞機關任職的看法。這不失爲一家之言。

二是當事人有難言之隱，故意否認某些史實。或出於另一動機，出爾反爾。如蕭紅的《呼蘭河傳》，台灣老作家孫陵在《文壇交遊錄》^④一書中，曾談及有版權之爭。可當事人駱賓基矢口否認此事。當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駱賓基接受盧瑋鑾的採訪時，又說出另一個版權之爭：蕭紅的繼母女兒，曾因《呼蘭河傳》版權問題，向北京中宣部告狀，要駱賓基把版權拱手讓出。從後者版權之爭，可推測孫陵講的另一個版權之爭，並非子虛烏有。盧瑋鑾設計的這條注釋^⑤，可看出她對某些當事人頗有微詞。

三是由於某些史料搜集者和整理者過分急於求成而造成的失誤。如一九七五年八月香港大學文社主辦了一個「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後來整理成一巨冊《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匯編》，雖有開創之功，但其錯漏失誤的地方很多，盧瑋鑾均毫不客氣地指出。對一九八一年第九屆青年文學獎負責人編寫的錯誤百出的《中山大學交流

香港的憂鬱

文人筆下的香港

(一九三五—一九四一)

盧瑋鑾

香港大學出版

團資料冊》，盧瑋鑾經過自己認真核對和考證後，亦著文一一為之指謬。^⑳對親朋回憶中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地方，以及少數人借寫香港文壇掌故抬高自己之處，盧瑋鑾亦以史家的嚴謹態度為之糾正。

盧瑋鑾的史料研究並不僅僅局限於考證，她還十分注重實地考察和實物史料的收集。《香港文學散步》一書，便是盧氏實地考察的成果。實物史料，則是文學史上的事物以其固有的物質形態流傳給後人的實體，包括作家的遺墨、遺物，以及舊居和工作地點。重視實物史料的搜集和利用，是文學史料學的優良傳統。盧瑋鑾正是這樣做的。她從留在香港的穆時英太太那裏獲得他們倆的結婚照等遺物^㉑，這無疑為穆時英的生平

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這些資料乍看起來價值不大，可到了盧瑋鑾手中，一是可以訂正某些史料記載之誤，二是可以與文學史上的記載互為印證。拿她在舊物店中購得香港淪陷時期葉靈鳳使用過的舊租單來說，上面寫的「羅便臣道四十七號B」，便可證實葉靈鳳當年確切的住址及其生活狀況。盧瑋鑾形容自己當時看見這個租單時，「簡直有如『驚艷』，心亂跳了一陣。沒有討價還價就高價買下來」^㉒。這在他人看來未免有點傻，但這正表現了盧瑋鑾的治史眼光。對「眾里尋它千百度」的學者來說，碰到這樣的實物史料焉能不驚喜？！

盧瑋鑾治史的另一特點，是十分重視報刊中文學史料的分布，尤其是注重報紙副刊的研究。眾所周知，作為一種報學現象，副刊是報紙的產物。副刊的誕生與發展乃至終止，始終與當時的時代氛圍和文藝生態有關。盧瑋鑾正是通過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的《大公報》的副刊《文藝》及《學生界》，才發現了與《呼蘭河傳》有密切關係的作品《後花園》。《後花園》這個短篇「究竟是《呼蘭河傳》的試筆練習，還是修訂重寫？」這成了盧瑋鑾及一切蕭紅研究者一個饒有趣味的課題。盧瑋鑾還通過《星島日報》《星座》、《立報》《言林》、《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以及《大公報》、《華商報》、《國民日報》各種副刊，看到了左右翼文藝力量的鬥爭和各種文學流

派的消長，觸摸到當時文學運動的起伏和文學思潮發展的脈搏，使她也使我們能窺見香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重要側面。

(四)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有「香港文學史料大王」之稱的盧瑋鑾，她展示的史料也不可能條條都對。比如豐子愷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舉行了三次畫展，盧瑋鑾在《豐子愷先生二三事》^㉓一文中，就遺漏了二次。可天下難找像盧瑋鑾這樣坦誠的人。她在《本在人間的豐子愷》^㉔一文的注釋中，公開承認自己的資料錯誤，並主動將其糾正過來。這樣做，並不會損害她治學嚴謹的形象，只會使人加深這種印象。又如她在《香港文藝活動記事（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後記》^㉕中，公開承認這個記事「不完備」，並主動揭自己的瘡疤，把它的缺點一五一十地羅列出來，這種做法不僅表現了她的謙虛美德，而且表明她對歷史的認真負責態度。這與某些冒牌學者極力粉飾自己，以劣充優或無限膨脹自己的做法，完全相反。由此也可見盧瑋鑾的人品與文品。

前面說盧瑋鑾是香港文學「史料大王」，其實這個稱號並不完全恰當。她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中文系，翌年入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一九七三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國文學。這種學歷說明

她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她決不會滿足於做一個「資料庫」，而是在掌握大量史料基礎上產生與眾不同的史識。《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⑩，便是她這方面的代表作，也是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必讀之作。由此文也可以看出她研究香港文學的態度：

一、充分了解香港社會的本質和文化背景，尊重香港文學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而不像別的地區的學者，用自己的社會意識形態強加於香港文壇，或用只適合於大陸或台灣的文藝評判標準去評品香港文學的優劣。

二、超越小團體的局限，力求客觀公正評價香港文學。香港沒有一以貫之的文藝政策，沒有像大陸那樣有統一的作家組織，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和文人相輕的陋習，形成了為數不少的「圈子」。作為一個香港文學研究工作

者，必須破除宗派成見，用一種超脫的態度去看待複雜的香港文藝現象，去評價不同色彩和不同流派的作品。盧瑋鑾的香港文學研究，正是努力這樣做的。

三、把研究工作建立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劉紹銘曾說：「讀書豈能無史？」^⑪而「修史焉能無史料」？在史料還未大量散失，在文壇先進還未完全辭世之前，應以魯迅說的「趕快做」的精神去收集史料，這正是盧瑋鑾長期工作的目標。

當然，「用十年時間去做搜集及訂

正資料，幾乎太浪費精力，到頭來還不及用一兩年時間寫幾篇論文，那麼快見到有益效應。而就算不畏困難，努力有了成果，也不容易公之於世，因為出版社不會樂意出版這類資料性質的東西。」^⑫可盧瑋鑾把這些功利觀念均拋到九霄雲外，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去挖掘香港文學史料，這是一種十分可敬的「傻子」精神。盧瑋鑾在一篇題為《眾裏尋它——追尋資料小記》的文章中^⑬，曾提到過研究香港文學需要「真正而誠實的研究者」。盧瑋鑾本人正是這樣一位「真正而誠實的研究者」。可惜的是，目前這樣的研究者還太少，希望以後能越來越多，都能像盧瑋鑾那樣不畏艱難在攀登科學高峯的道路上走下去，寫出一部學術界期望已久的客觀公正、史料翔實豐富的《香港文學史》來。對此，我們寄希望於盧瑋鑾女士，同時也寄希望於其他香港文學研究工作。

注：

- ①(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 ②羅孚：《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一九頁。
- ③(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八月版。
- ④黃繼持：《香港文學散步·序》。
- ⑤香港，華風書局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
- ⑥香港，問學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版。
- ⑦香港，華風書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
- ⑧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香

港文學》一九八八年第十二期。

⑨《八方》叢刊第六輯，香港文學藝術協會一九八七年八月版。

⑩(台灣)《聯合文學》九四期，一九九二年八月出版。

⑪見《香港文縱》，第五三—九二頁。

⑫《八方》叢刊，第五輯，一九八七年四月版。

⑬見《香港文縱》，第九三—一三三頁。

⑭(香港)《抖擻》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一年五月，第四一—四六頁。

⑮《抖擻》第四十期，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版，第四十五頁。

⑯巴桐：《四十年香港文學活動一瞥》。該文首刊於廣州出版的《當代文壇報》，後收入作者的《香島散記》，(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版，第一五〇—一五九頁。

⑰同⑫。

⑱分別見《香港文縱》，第一四三—一六一頁，一七六—二二一頁。

⑲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版。

⑳見《歷史·話舊·懷念——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文集》，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廣州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會籌備出版，第五三—五五頁。

㉑《香港文縱》，第二〇六頁。

㉒(台灣)大業書店一九五五年四月版，第五—十頁。

㉓《香港文縱》，第一六九頁。

㉔同⑧。

㉕、㉖盧瑋鑾：《眾裏尋它》，《香港文學》第一百期，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

㉗(香港)《明報月刊》八卷三期，一九七三年三月號。

㉘見《香港文縱》，第一七一—一七四頁。

㉙同⑨。

㉚同⑧。

㉛(台灣)《文訊》五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版。

㉜同⑧。

㉝同②。